

推免生,一场水平与公平之争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每年的10月都是一个与“考试”有关的月份。公务员报名、高考改革政策出台吸引了众人眼球,而10月也注定是高校招收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最忙碌的月份——高校迎来一场接一场的推免生笔试、面试。

推免生,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不用参加常规的研究生考试,但是从取得推免生资格,到最终被心仪的高校免试录取,也并不像常人想象的轻松。尤其是近年来,部分高校推免生比例过高、内推生过多、考试注水等问题,使得推免生选拔陷入了一场新的水平与公平的争议之中。

近日,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要求,着力提高推免生选拔质量,加强推免生校外交流,推动推免招生与统考招生协调发展等等。那么,推免生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现有的推免生制度还有哪些改进空间?

唯分数论的延续

国内的推免生通常是如何炼成的呢?

在国内某知名师范院校中文系本科生林霖眼中,想要取得推免生资格,第一要务就是把本科前3年的大小考试拿下,体育课、通识课一个都不能少。林霖所在的中文系同年级有100多人,“只有英语通过四六级、综合排名前30名的学生才能获得推免生资格,而考试成绩往往在综合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陕西某“211工程”高校传播系学生黄琼对此深有同感。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学校的推免生政策,尽管删去了学生工作的加分,但是对学术能力的考查,鼓励仍然不够。譬如,发表论文可以加1分,且没有字数、刊物级别的限制,但是同学中几乎没有人发表过文章。“因为跟考试成绩比起来,写论文费时、费钱、费精力,更重要的是加分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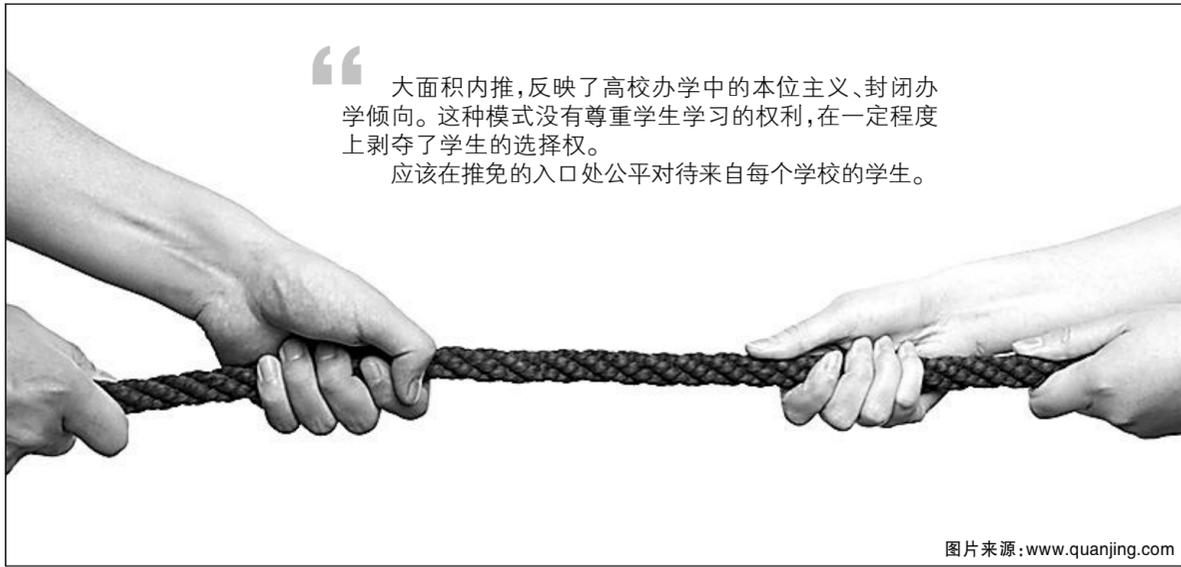
在成为推免生的道路上,人们仿佛再次看到高考的身影,分数的指挥棒在挥动,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指出,如今从重点高校到地方院校“死读书、读死书”的问题比较严重,一些所谓的优秀学生并不是真正“会读书”,而是“会考试”,尤其擅长考老师讲过的内容。通过考试成绩优秀获得推免生资格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研究生招生对生源素质的要求。

他进一步指出,研究生招生的要求是招收具有创新精神,受过比较好科学训练、理论基础、应用能力相对较强的优秀本科生。然而,目前高校对推免生资格的认定,大多是简单的行政操作,即教务处计算出学生的排名,然后从前往后确定学生是否有推免资格。“各个院系、专业推免出来的学生没有经过学术考核,只有通过这个学术考核环节,具备一定学术潜力的优秀本科生,才能享受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资格。”

学校越好,外推越少

在国外大学,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不鼓励学生留在本校读研。读博,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亦是如此。因为只有把学生推向不同的校园文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大面积内推,反映了高校办学中的本位主义、封闭办学倾向。这种模式没有尊重学生学习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应该在推免的入口处公平对待来自每个学校的学生。”

化,思想才会更活跃。

而在国内,虽然嘴上不言明,但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更愿意招收本校的推免生。这类高校,尤其以“985工程”高校为代表。

林霖告诉记者,鼓励学生外推的专业,一般来说学科实力较弱。她所在的专业由于学科实力较强,大家都在努力争取内推。

“排名靠前的学生不愿意也不敢外推。”林霖说,更重要的是,学校规定如果选择外推,就意味着要放弃内推的资格;同时,腾出的一个内推名额,可以顺延给同级的同学。可是,没有人愿意承担外推失败的风险。“只有排名靠后的学生,才会无奈地选择外推。”但是,少有人愿意保送去学科实力更弱的高校。

最后的结果就是,林霖同专业的推免生,全部内保到本校,外推到其他高校的人数为0。

别敦荣表示,“985工程”高校优秀生源内部消化的情况,近些年来在个别高校有所松动,但总体上依然还存在。“大面积内推,反映了高校办学中的本位主义、封闭办学倾向。这种模式没有尊重学生学习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

事实上,把排名靠后的学生推向校外,恰恰反映了部分高校忽略了人才培养中的“七八九”现象。别敦荣告诉记者,有人做过考察,走向社会最有成就的人,往往不是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名的学生,而大多是第七、第八、第九名的学生。这部分学生总体排名靠前,但又非名列前茅,他们学习能力较强,综合素质比名列前茅者更强,成功的几率往往比后者更高。

“内部消化现象的存在,是高校执行推免生政策的一个误区。学生在一所学校学习,已经熟悉了其教育和校园文化;如果换一所学校读研、读博,可以接触到另一种新的教育和文化。这对于学生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别敦荣说。

创新,让青春与挑战共舞

——第十三届“挑战杯”竞赛决赛侧记

■本报记者 陈彬

10月14日晚,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体育馆外,陆续走出体育馆的观众似乎还都沉浸在刚才演出的美好回味当中。

在这座体育馆里,第十三届“挑战杯”交通银行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开幕式刚刚结束,虽然严格控制了开幕式成本,但整场演出的精彩程度没有丝毫削弱,精彩的表演也令观众大呼过瘾。

此后的3天时间里,也正是在这座体育馆内,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450多所高校的数百件参赛作品所碰撞出的创新火花,迸发出另一番更加别样的精彩。

一次创新:用交叉协同打破门户之见

作为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赛事,“挑战杯”自1989年正式举办以来,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之前也已经举办了12届。正如该项赛事“秉持创新”的理念一样,“挑战杯”的每一届比赛似乎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比如,今年的“挑战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并由苏州大学和苏州工业园区共同承办,这也是该项赛事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地方高校承办。

“将如此重要的赛事交给地方高校承办,这本身就说明了国家对地方高校的支持与重视。”自两年前苏州大学获得第13届“挑战杯”的承办权之后,该校团委副书记肖甫清就一直担任着赛事的组织协调工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肖甫清如是说。

今年“挑战杯”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奖项的设置中,增加了累进创新奖与交叉创新奖。

据了解,所谓“累进创新奖”,针对的主要是往届“挑战杯”参赛作品,这些作品要么较之前参赛时有重要进展、要么在孵化方面有新的进步、要么到学校支持基金培养或被政府采纳与实施;“交叉创新奖”针对的则主要是本届“挑战杯”竞赛的新作品,这些作品要涉及多个学科,并在相关研究领域突出体现作者的跨学科研究能力。

据负责“挑战杯”评选工作的团中央相关负责人介绍,“累进创新奖”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鼓励各高校对“挑战杯”参赛项目进行“继续支持和培育”。而“交叉创新奖”的评选则是顺应了交叉学科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趋势,建立全面的“研究能力体系”。

一份兴趣:国外没实现,不代表我们不行

段启凯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在本届“挑战杯”上,他的展台除了陈列着各种项目资料和样品模型外,还多了一样东西——一盒整齐整齐的名片,而之所以这样做,他有着自己的打算:“我们的这个项目实用性很强,如果可以,我们希望和校外做一些洽谈,做一些产业化的拓展。”

然而3年前,当段启凯第一次接触到课题时,他很难想到3年后的今天,自己会在这里畅想产业化。

“我的项目叫‘金属粉末凝胶注膜成形技术’。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于用做石膏模具的方式进行金属铸造,这一设想其实国外早已有之,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这也说明了它的难度之大。”段启凯说,而为了攻克这一难题,3年来,这位年轻的本科生和他的科研伙伴们几乎没有真正放过一个寒暑假,把全部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

“最难的那段时期是一个国庆节,为了克服一

招谁,学校有谱吗?

毕竟,内推,学生对本校知根知底。外推,学生可就要遭遇气象万千。

黄琼就曾经遭遇过一场“人仰马翻”的外推生考试。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赶到广东的一所“211工程”高校,可是她见到的场景却是只招20多人的专业,浩浩荡荡来了100多人,“只要是一本院校的学生申请都被通知来考试”。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考场座位不仅座位不够,还有人掏出手机查询。不仅如此,“申请硕博、学硕的在一起考试,面试时没有老师问专业问题”。

考试的结果,黄琼自然不抱希望,因为很明显,这是一场走过场的考试。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黄琼遭遇的“走过场”,恰恰是因为大学招生中缺少一个独立的部门——招生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可以干预招生的结果,招生的标准很模糊,招生的过程也不透明。

他举例,行政干预下的招生,往往会设置诸多条条,譬如有的大学明确规定研究生招生时,要招多少个“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学生,达到这个标准,表示今年招生情况良好。这就背离了推免生考核中的学术标准。

“设置专门的招生委员会,一方面,可以发挥制定相关学术标准的功能,从而避免行政干扰,招收符合学校特色的学生;另一方面,一旦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招生委员会有权向相关行政人员追责。”熊丙奇说,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本科生自主招生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大家才会担心出现潜规则。

比例之争

教育公平是人们最关注的高等教育话题之

一,甚至有时候超越了关注教育水平本身。

翻开前些年的推免生数据,北大、清华、复旦等“985工程”高校的推免生比例触目惊心,有些专业的推免生比例高达80%以上,甚至还有被推免生“包围”的专业。

根据《通知》中的要求,各招生单位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50%。推免生的比例固然可以通过政策加以限制,然而对于教育公平而言,这还远远不够。

熊丙奇认为,如今获得推免资格的高校多集中在“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及部分省属院校,应给予普通院校、民办高校同等的推免资格。他解释,“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普通高校的行政划分,造成了高等教育的首轮不公平。如果在推免制度上再设高校层次的门槛,实际上就是对普通高校、民办高校学生的变相歧视。“长此以往,还会加强基础教育的‘名校情结’,学生宁可复读考‘985工程’、‘211工程’的高校,也不去读二本、三本。”

“实际上,大学生本身的素养并不能由某个大学决定。虽然二本、三本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学校的学生就没有学术理想和追求。”熊丙奇说。

尤其是在推免专业硕士的当下,“更应该给二本、三本学生推免的机会”。熊丙奇同时强调,并不是说只给二本、三本学生推免专业硕士的机会,而是学术型硕士、专业硕士均允许,“应该在推免的入口处公平对待来自每个学校的学生”。

别敦荣则提醒,如今有300多所高校获得推免的资格,如果把最近10年成立的本科院校除外,获得推免资格的高校已经占到老本院校学校的70%左右,基本能反映高等教育的质量差异。“推免生遵循优胜劣汰的逻辑,短期内大量增加高校范围,难免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导致降低推免生的声誉,再要扩大范围须格外谨慎。”

一脉传承:每个灵感迸发都是新起点

在“挑战杯”现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细胞机器人”站台的“摊子”算是铺得比较大的——除了站台之外,他们还利用会场中间的一块空地,让机器人在那里自由地运动着。

“细胞通过分裂和分化形成不同组织,进而形成生命体,我们就是受此启发开发了这台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今年在北航读研一的杨健勃介绍说,该机器人由几个外形以及内部机械结构完全相同的细胞单体构成,通过“增殖”和“分化”构成细胞组合体,可以呈现包括虫形、双足、四足在内的各种形态。

杨健勃和他的团队开始这一项目时还在读大三。几年下来,他的团队一直由三个人组成,这样的规模在“挑战杯”的团队里算是少的。但杨健勃并不觉得缺人手,因为经常会有学弟学妹们来帮帮忙。

“其实我们也承担着培养任务,参加我们团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杨健勃说,他们的研究中,包括了机械、电控、软件等多方面的知识。“参与人员在制作过程中能学到很多,而他们每一点的灵感迸发,都可能促成一项新的研究。”

这些年来,杨健勃的项目组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在师弟师妹中间“孵化”出了五六个科研课题。2011年,杨健勃团队获得了北航校内“冯如杯”科技竞赛的特等奖,而就在第二年,一个由他们“孵化”出的项目,便捧得了新一届“冯如杯”特等奖。

“每一点灵感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在进行一种传承。有时,这比做科研本身还要有趣。”杨健勃说。

中国大学评论

于光远奥巴马和辽宁文科状元

■卢晓东

2013年9月26日,于光远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于光远先生的一生已有报刊专文总结,比如《中国青年报》就刊发特稿《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予以纪念。从文章中,我们特别看到了于光远先生在改革大潮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然,作为教育学者,笔者更关心于光远先生的学历和成长道路。

1934年,于光远先生通过转学考试,从上海的大同大学转到清华大学物理学专业三年级,成为钱三强等物理学大家的同学。1935年,在北平,于光远先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放弃了物理学家的梦想而投身抗日救亡。

转学、清华、北平和“一二·九”,就这样成为于光远先生一生最重要转折点。于是我们知道那时的清华大学就有“转学”制度的存在,知道清华大学按照这样的制度从一般大学招收转学学生,其中于光远这样的转学学生在中国的进步中发挥着正能量。

我们早已经知道,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也是转学学生。1981年,奥巴马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转学到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西方学院是一所四年制小型文理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巨型研究性大学相比算不上一所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其广阔的学术背景和地处纽约的位置,同样开阔了奥巴马的眼界,对其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校的经历为奥巴马增加了美国西部和东部的地域文化背景。转学、哥伦比亚、纽约,同样成为奥巴马一生转折的关键词。

于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同样有着这样的转学制度,哥伦比亚、哈佛大学等大学都从一般大学招收转学学生,其中会有“奥巴马们”成长为美国社会的精英。2010-2011学年,哥伦比亚大学招收了123名转学学生,占在校生数的2%。

当我们认真研究美国的转学制度,会发现转学制度已经成为其高等教育系统成功的关键秘密之一。转学制度的内在逻辑是,无论多完美的录取制度也有缺点,需要通过转学制度予以弥补。转学制度的重要性至少发挥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从一般高校接收转学学生,能普遍给一般高校学生巨大的学习动力与期望,这成为一般高校学生持续学习的重要学习动力。与此同时,转学也给予了那些在高校学习过程中发现自身潜力和抱负学生新的机会。他们通过转学调整学校,才能将优质教育资源与学生的天赋、潜力和抱负很好地匹配起来。

第二,一般大学从一流研究型大学接收转学学生,这些转学学生不适应一流大学的学习,在前一年或者两年中遇到巨大的学习困难面临淘汰,转学制度同样成为他们的希望和避风港。一流大学因为转学制度才能减少淘汰的压力,保持较高的学术要求,淘汰不适应的学生,进而把机会和教育资源给予更加合适的学生。

2013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从香港大学文学院休学,计划复读一年再次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对此,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有所回应,即刘丁宁“想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必须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北大不会直接录取”。对于何为“正常的途径”和“正常的程序”,舆论十分关注,尤小立先生也在《中国科学报》撰文予以质疑,认为北大有官僚主义倾向。他认为面对刘丁宁,北大可以更优雅。

然而,北大何以优雅不起来呢? “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为专门的转学条款,但只规定学生如何转学出北大。对于如何转入北京大学,二十四条第二款只有一句话:“校外学生要求转入本校者,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办理。”

《普通高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为教育部2005年3月颁布,是高等学校学籍和日常管理的基本法规。《规定》第十九到二十一条为转学条款。其中第二十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一)入学未满一学期的;(二)由招生所在地的一批次录取学校转入上一批次学校、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三)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四)应予退学的;(五)其他无正当理由的。”第二十一条:“学生转学,经两校同意,由转出学校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认转学理由正当,可以办理转学手续;跨省转学者由转出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学手续。”其中二十条第二款基本涵盖了“于光远们”的希望。

以上就是“正常的途径”和“正常的程序”。程序中北京大学实际说了不算,还需要北京市教委同意。另外,刘丁宁入学未满一学期,也明显不符合教育部规定,北大如果现在办理转学,第一违法,第二也办理不成。按照笔者多年经验,刘丁宁即使在港大学满一年,转学成功的几率也不大,因为转学目前并不是大学的自主权,不是北大作为一所大学说了算的事情。

我们发现在目前的转学制度下,“于光远们”再也不可能,“奥巴马们”也没有机会,刘丁宁似乎早早就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于是乖乖走回了高考的老路,把学会的东西再学一年,去浪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北大无法优雅起来,清华也多年无法招到“于光远们”了,他们一起声讨兴叹,说些不疼不痒的话,因为难以淘汰而只能把大量的经费浪费在早已发现的不合格学生身上,似乎经费不来自税收。

目前大陆转学制度的内在逻辑是,高考一定是完美的;即使高考不完美,我们也决不在制度设计中予以纠正。我们不给那些新出高的“失意者”新的机会,也绝不给予那些新出现的翘楚们以“择良木而栖”的机会。浪费年轻人的生命有什么问题? 大学浪费税收有什么问题?

转学制度目前需要改革吗?遗憾的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希望。